

明史研究论丛

第五辑



明史研究论丛

第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明史研究论丛

第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401,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 7-80519-293-6/K·165

责任编辑 胡多佳 定价：9.00元

目 录

学术论文

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社会的

- 政治的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吴 晗遗稿 (1)
- 明初火铳铭文浅析……………王兆春 (69)
- 从两份档案材料看明代徽州的军户……………彭 超 (86)
- 潞王府的庄田、店业考述……………苏德荣 (105)
- 略论明朝后期嘉兴府争田……………廖心一 (125)
- 胶山桂坡馆安国的家世……………王赓唐、赵承中 (146)
- 1619年的辽东战役……………黄仁宇 (174)
- 明朝后期与辽东蒙古的关系……………袁森坡 (197)
- 薛方山的心学思想及其它……………孙开泰 (229)
- 朱舜水思想剖析……………韦祖辉 (247)

史料研究

- 明稿本《玉华堂日记》中的经济史资料研究……………张安奇 (268)
- 《皇明遗民传》朱文瑜传辨析……………宁 生 (312)
- 《明故太孺人史母杨氏墓志铭》考略……………任 昉 (314)

史料搜萃

- 《天爵堂笔余》……………王春瑜点校 (322)
《稼轩瞿府君暨
邵氏合葬行实》……………余行迈、吴奈夫、何永昌点校 (357)

港台及国外论文选载

- 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美国]陈学霖 (418)
明初的察举(1368—1398)……………[台湾]林丽月 (451)
16—18世纪中国、菲律宾和美洲之间的
贸易……………[香港]全汉升 (470)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成为天主教徒
试释……………[美国]W.J.裴德生、朱鸿林 (477)

学术动态

- 近二、三年间日本明史研究
的动向……………[日本]山根幸夫 (498)
对《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
的评论……………[美国]林恩·斯特拉夫 (507)
间野潜龙《明代文化史研究》简介……………任道斌 (509)

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社会的政治 的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

吴 晗

一 新仕宦阶级的产生

十四世纪勃发的民族革命，经过了二十年（西元一三四八至一三六八）的长期战争，方才告一结束。战争所波及的地带，北至和林，东至高丽，南至两广，西至陕、甘，无一地不受蹂躏。战争的主角最初是被统治的南人、汉人，向统治者的蒙古、色目人进攻，夺取当地的政权，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后来这些割据者的向外发展，引起各个利益的冲突，陷于混乱的互相残杀的吞并战中。同时对方的统治阶级也发生内部的政变——政权和军权的争夺——也同样的互相吞并，发生内战。这样，一方面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断地在苦战，一方面统治者因内部分化而发生内战，被统治者也因个别发展而互相吞并。结果，双方实力俱因内战外战而减削，许多有地盘有实力的领袖都自然地被淘汰，被吞并，形成一个混乱的、分裂的、多元的局面。最后统治者因内乱而失去抵抗的能力，被统治者的无数反抗集团则为一后起的有力的革命领袖所吞并，一蹴而将盘踞中国百余年的外族逐出塞外，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汉族自治的大明帝国。

这一次大混战的发动，动机是民众不堪外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压迫而要求政权的让与，〔1〕最后才一转而喊出民族革命的口

*这是吴晗先生未曾发表过的遗稿，1943年撰写于昆明。现予刊出，以纪念这位明史研究的开拓者。

号。〔2〕在革命开始时，外表上蒙着极浓厚的宗教的迷信的罩袍，绝大多数的革命领袖和群众都是白莲教和弥勒教——明教的信徒，举行着种种仪式，宣传弥勒下世、明王降生、救民疾苦的口号。〔3〕接着又加上政治的宣传，势力最大最成功的一个宗教领袖韩林儿又假托是宋徽宗的子孙，把这次革命解释为宋的复国运动。一直到朱元璋出来，他自己本人及其军队虽然原来隶属于上述的系统，可是他一到了能独立行动的时候，他便决然地舍弃这双重的矛盾的策略——肤浅的欺骗的神话宣传和已经失去时效的冒牌的复宋掩护旗帜，更进一步赤裸裸地提出这一次的革命的目标是民族的解放，汉族应由汉人治理的大宣言。这一鲜明的划时代转变，更掀起了过去百多年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仇恨，得到知识份子和一般民众的深切同情，地主们也因旧秩序的维持和利益的保全而加入合作，在各阶层支持之下，这一新兴势力在十年中便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把整个汉族从蒙古人铁蹄之下解放出来，民族革命成功了！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二十年混战的结果虽然完成了民族革命的伟业，而在实质上，分析战争双方所含的因子，官吏地主商人完全拥护旧势力，和蒙古皇室及贵族站在同一战线。在对面，革命的无数领袖——方国珍和张士诚是贩私盐的，陈友定是农人，韩林儿的祖父被罪迁谪，郭子兴是相命人的儿子，陈友谅为渔家子，徐寿辉是贩布的，明玉珍家世务农，朱元璋是游方的穷和尚——及其群众却完全是另一阶级。贫农、佃户、流民组成了以推翻统治者为目标共同的革命势力。阶级意识的潜伏性划分了双方的群众，农民和地主冲突的尖锐化发动了这一次战争。统治者是代表地主利益的，革命集团所代表的却是农民的利益，所以在表面上尽管是揭出政治的民族的解放口号，而在实质上，却完全是农民和地主的斗争。可是到后期，民族意识的强烈自觉，使革命集团的口号从经济的政治的被压迫，转而偏重于民族地位的歧视方面

去。因之，民族革命虽然完全成功，这一群领导者却已为胜利之杯所炫惑，忘记了当初起事时的动机和目标，外族的压迫虽已解除，同族同种间的畸形的经济社会组织，却并未因之而有所改变。并且，这一群成功的领袖，都因他们的劳绩从下层爬到最上层，从平民变成新贵族，从农民变成大地主，代替他们所打倒的外族贵族地主的地位。同时，因参加维持旧秩序而加入朱元璋集团的旧地主，也因劳绩而成为新朝的中层基础，出任新政府和农民的中间人——如粮长、里长、甲长——或直接参加政府，他们的大量土地和社会地位，都因之而为法律所默认。再加上新朝由科举出身的新官僚地主，和正在科举阶段中的举贡生员，皇家子弟和皇帝的外亲及宫廷奄竖——这一新地主集团成为新帝国的新重心，新基础。我们名之曰新仕宦阶级。以暴易暴，农民所受的剥削日积月累，愈来愈重，新统治者的榨取技术经过长期的训练，却愈来愈高明。在这新的对立之下，造成了明代无数次的农民叛乱，最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竟颠覆了这帝国。

由经济的政治的革命转变为民族革命，虽然在当时是革命成功的主要手段——保护旧地主的利益和容纳旧官僚——可是同时也正因为这转变，忽略了革命之所以发生的背景，和最初所指出的社会病态，不能对最切要的土地问题加以彻底的合理的解决，这是一个最辉煌的成功，同时也是一个最严重的失败。〔4〕

以下分两部分叙述，第一是新仕宦阶级，第二是农民。〔5〕

新仕宦阶级部分所研究的对象是这一阶级的社会地位，所造成的政治病态，寄生于农民阶层的情形，他们的生活，这一阶级所产生的文化——文学、戏剧、小说、音乐、金石学、建筑学和社会风气。

这一论文只是概括的普泛的说明，至于属于这一阶级的思想家如薛瑄、王阳明、刘宗周、黄道周等人，文学家如宋濂、归有光诸人，所谓独立特行之士，不为这一阶级的风气所同流合化者，

不包括在本文说明之内。

二 法律所规定的特权阶级

明代士庶两阶级的分别，从《大明律·名例》里关于文武官犯私罪一条最可以看出。这条例规定：“文武官职，举人监生，生员，冠带官，义官，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但有职役者，犯赃犯奸，并一应行止有亏，俱发为民。”“发为民”的意思就是褫夺仕宦阶级的特权。

仕宦阶级最重要的特权是免役。士人一入学校，除本身外并免户内二丁差役。^{〔6〕}温宝忠的《士民说》里有这样的话：“民间二十亩之产，不得一襦袍，则里役立碎。”^{〔7〕}意思是说小农家如没有人进学校，有一个青衿作护符，则其家业立为徭役所毁碎。关于见任官的免役，明太祖曾特降诏令说：

“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著为令。”^{〔8〕}

明代里役之制，以十家为甲，百家为里，每年按甲轮值为官府服役。里长、甲长在原则上以殷户（地主）充当。里役最为庶民所苦，独仕宦阶级可置身事外。明末刘宗周曾疏言其不平。他说：

“臣生之初，见现年里役，亦止费二三十金，积至五六十金，今遂有赢至百金者。至一承南粮解户，则计亩约费三五两不等，而家尽破矣。独官户偃然处十甲之外，不值现年。”^{〔9〕}

致仕官家居——乡绅，除免役外，其尊严亦有法令的保障。这法令颁布于洪武十二年（西元一三七九）八月辛巳：

“上谕中书省臣曰：凡士非建功名之为难，而保全始终为难。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其居乡里，惟于宗族叙尊卑如家人礼，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如与同致仕者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必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敢有凌侮者论如律。著为令。”〔10〕

甚至有由所在县官送门皂、吏书承应，体貌一如在官时。〔11〕其所享受之特权并可庇及宗族。〔12〕

蓄奴也是次要的特权，反之庶民如存养奴婢，便须受法律制裁。〔13〕

一般进士举贡生员，在法律上亦著有优待之条文，死罪至三宥，《明太祖实录》记：

“洪武二十年三月丙辰，常州府宜兴县丞张福生犯法当死，特宥之。

先是，上以进士国子生皆朝廷培养人材，初入仕有即丽于法者，虽欲改过不可得，遂命凡所犯虽死罪，三宥之，福生以国子生故得宥。”〔14〕

太祖以后，这一条法令虽然无形取消，但生员如犯刑章，地方官在行文学校褫革其衣衿以前，仍不得加以刑责。如所犯非重罪，也只行文学校当局，薄责了事。其家道寒苦，无力完粮者，并由地方官奏销豁免，因之不但本人免役免赋，甚至包揽隐庇，成为利源。顾公燮记：

“明季廩生官给每岁膏火银一百二十两。……贫生无力完粮，奏销豁免。诸生中不安分者，每月朔望赴县恳准词十张，名曰乞恩。又揽富户钱粮立于自名下隐吞。故生员有坐一百走三百之语。”〔15〕

这一阶级的居室间数，建筑方式，衣服材料颜色，舆马仪从，相见礼貌，一切都按地位高下，由政府分别予以规定，不许紊

越。〔16〕为保障阶级的尊严，并著令不许和非类为婚，违者置法。例如明初李宜之案。

“洪武十七年二月甲申，降江西布政使李宜之为广西思恩县主簿。时，宜之在任，以小隶为婿。事闻，故降用之。”〔17〕

三 进入仕宦阶级的梯子——科举和学校

明太祖既统一了全国，用残杀的恐怖手段，用新的行政机构来集中政权，增高皇帝的威严。洪武十三年（西元一三八〇）以后，他个人综揽国家庶务，朝廷大臣都成了备位的闲员。历史上记着他在八天内所处理批阅的诸司奏札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18〕平均每天有二百多件，四百多事，真可算是“衡石量书”“传餐而食”和秦始皇、隋文帝鼎足而三了。他拼着命干，不肯放松一点，专凭残杀来救济个人精力所不及。〔19〕但隔了一两代，娇生惯养的年青皇帝受不了这苦工，政权便慢慢转移到皇帝的私人秘书——阁臣——手上。英宗以后，诸帝多冲年即位，政权又慢慢地从外廷秘书的阁臣，转移到内廷秘书的司礼监手上。阁臣和司礼监——外廷和内廷的政权互为消长，也间或有同流合污的时候，皇帝只是一个傀儡。皇族除了拿禄米，多养孩子，在封地渔虐平民，肆作威福以外，绝对不能作一点事。中央的政权被宦官，地方的政权被仕宦阶级所把持。他们和他们的宗族戚党同时是大地主，也是大商人。因此这一阶级所代表的也只是这两种人的利益。

皇族指皇家子弟，数量很多。从明太祖起繁衍到明末，这一家系有十几万人。外戚包括帝婿、所谓駙马和皇族的女婿。最主要的是后妃的家族。这两类人都因血统的结合而取得地位和特权，在政治上不起作用。宦官的产生最简便，经过生理上的改变便可取得资格，在政治上取得大权，惟一途径为博得皇帝欢心，方法不外乎“便嬖柔佞，妾妇之道”。这三类人都纯粹是社会的寄生虫。皇

族在明代前期不许参加考试，也不许在政府服务，到末年才开放这两条禁例。外戚和宦官则以其特殊地位，其子弟宗族亲戚门客往往因之而获得科名和官职，间接的产生新官僚地主，影响政治的清明。

至于庶民进入仕宦阶级的主要途径，主要的有两条大路，一是科举，二是学校。参加科举和进学校的敲门砖只有一块——八股文。明制参加科举的必须是府州县学的生员和国子监的监生，学校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以此这两条路其实是一条路。

科举制度分三段，生员考试（入学考试）初由地方官吏主持，后特设提督学政官以领之。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入学者谓之诸生（有廩膳生、增广生、附学生之别）。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式者再经皇帝亲自考试曰殿试。殿试发榜分三甲，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举人贡生不第入国子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及州县正官，或州县学教授，明制入内阁办事者必为翰林，而入翰林者又必为进士。宣德（西元一四二六至三五）以前政府用人尚参用他途（如税户，人才，吏员，征辟等），以后则专用科举。科举和铨选合而为一，一旦及第，便登仕途，由此全国读书人都以科举为惟一出路，科举之外无出路，科举之外无人才。王鏊曾畅论这一制度的弊端：

“古者用人，其途非一，耕钓渔盐版筑饭牛皆起为辅弼，而刍牧贾竖，奴仆降虏，亦皆得为世用。我太祖太宗之世，亦时时意外用人，若郁新、严震直之流，皆以人才至尚书，取之非一途，故才之大小，纷纷皆得效用于时。降及后世，一唯科目是尚。夫科目诚可尚也，岂科目之外，更无一人乎？”

有人焉不独不为人知，即举世知之而不见用，非不欲用，不敢用也。一或用焉，则群起而咻诸，亦且自退缩，前后相戒，谨守资格，……是故下多遗贤，朝多旷事，仕法之过，端至是哉！”〔20〕

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的精力集中于科举，科举名额有规定，考试规定便日趋严酷，搜检防闲，如对盗贼，祈寒盛暑，苦不可言。艾南英曾描写明代科举的苦况说：

“试之日，衙鼓三号，虽冰霜冻结，诸生露立门外。督学衣袂坐堂上，灯烛辉煌，围炉轻暖自如。诸生解衣露足，左手执笔砚，右手执布袜，听郡县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学前。每诸生一名，搜检军二名，上穷发际，下至膝踵，裸腹赤踝，为漏数箭而后毕，虽壮者无不齿震冻栗，腰以下大都寒伍僵僵裂，不知为体肤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学轻绮荫凉，饮茗挥箑自如。诸生什佰为群，拥立尘盆中，既不敢挥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数百人夹坐，蒸薰臃杂，汗流夹背，勺浆不入口，虽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饮，饮必朱钤其牍，疑以为弊，文虽工，降一等，盖受困于寒暑者如此。

既试，吏西立，瞭望军四名，诸生无敢仰视四顾，踞立伸欠，倚语侧席者，则又朱钤其牍，以越规论，文虽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虽溲溺不得自由，盖所以繫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置坐席取给工吏，吏大半侵渔所费，仓卒取办临时，规制狭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疏缝，据坐稍重，即恐桥仆，而同号诸生尝十余人，率十余人坐，以竹联之，手足稍动，则诸坐皆动，竟日无宁时，字为跛踦。”〔21〕

中叶以后，士风日替，怀挟抢替，成为习惯。徐学谟说：

“会闈自庚戌（嘉靖二十九年，西元一五五〇）后，举子多怀挟博进取，有掇大魁者。始犹讳之，至丙辰（嘉靖三十五年，西元一五五六）以来，则明言而公行之矣。此仕进

之一大蠹也。”〔22〕

奔竞嘱托，毫无忌惮。陈民绪记：

近时奔竞最甚，无如铨选考试两端。督学试士，已不免竿牍纷沓。若郡邑之试，请嘱公然，更不复略为讳，至有形之章奏，令童子纳金饷，无使缙绅专利者。〔23〕

到末年士子多以关节得第，商人地主的子弟以金钱换科名。

科场之事，明季即有以关节进者。每科五六月间，分房就聘之期，则先为道地。或伏谒，或为之行金购于诸上台，使得棘闱之聘，后分房检取如握券而得也。每榜发不下数十人。〔24〕

在这制度之下所造成的新官僚，以利进自然以利终，读书受苦是为得科名，辛苦得科名是为做官，做官的目的是发财，由读书到发财成为一联串的人生哲学。黄省曾曾说当时的士人以士为贾：

吴人好游托权要之家，……家无担石者入仕二三年即成钜富。由是莫不以士为贾。而求入学庠者，肯捐百金图之，以大利在后也。〔25〕

谢肇淛更指出这制度和吏治的关系，和社会风气的关系，家庭教育的关系：

今之人教子读书，不过取科名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故子弟往往有登臆仕而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为幼之受苦，政为今日耳。志得意满，不快其欲不止也。〔26〕

刘宗周所论士习之坏影响于政治及社会，尤为明切。他说：

自科举之学兴而士习日坏。明经取金紫，读易规利禄，自古而然矣。父兄之教，子弟之学，非是不出焉。士童而习之，几与性成，未能操觚，先熟钻刺，一入学校，闯行公庭，等而上之，势分虽殊，行径一辙，以嘱托为通津，以官府为奴

隶，伤风败俗，寡廉鲜耻，即乡里且为厉焉，何论出门而往，尚望其居官尽节，临难忘身，一效之君父乎？此盖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27〕

由此可知这个时代的吏治贪污，寡廉鲜耻，是有其历史的背景的。进学校得科名的惟一手段，是作制艺——八股文，此外的学问都非必要，不妨束之高阁。以此在这制度下所造成的学风是空疏浅薄。除八股外，于历史政治经济各方面一无所知，哲学科学更是莫名其妙。这弊病明初学者宋濂即曾痛快地指出。他说：

治古之时，非惟道德纯一而政教修明，至于文学之彦，亦精瞻弘博，足以为经济之用。盖自童草之始，十四经之文，尽以岁月，期于默记，又椎之于迂、固、范曄之书，岂直览之，其默记亦如经。基本既正，而后偏观历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异同，会其纲纪，知识益且至矣。而又参于秦汉以来之子书，古今选定之集录，探幽索微，使无遁情。于是道德生命之奥，以至天文地理礼乐兵刑封建郊祀职官选举学校财用贡赋户口征役之属，无所不诣其极。或庙堂之上有所建议，必旁引曲证以白其疑，不翅指诸掌之易也。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笈，是钻是窥，馀则漫不知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呜呼，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孰谓如是之学，其能有以济世哉！〔28〕

中叶时唐顺之也说：

经义策试之陋，稍有志者莫不深病之矣。……至于以举业为教，则稍有志者亦知深病其陋矣。〔29〕

谢肇淛亦大加攻击：

我国家始以制艺为不刊之典，士童而习之，白而纷如。文字之变，日异月更，不可穷诘，即登上第取华旆者，其间醇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刍狗，不足训今，不可以

传后，不足以稗身心，不足以经世务，不知国家何故以是为进贤之具也。〔30〕

末年周顺昌至坦白自悔不多读书，为一不识时务进士：

漫以书生当局，其筹边治河大政无论，问以簿书钱谷之数天下几何，茫然不能对。始知书不可不多读，平日止为八股徒，做一不识时务进士，良可叹也。〔31〕

清吴翌凤记一明钜公故事，虽未免刻薄，却的是史实。

故明一钜公致政家居，偶过友人书塾，询其子弟所读何书，曰《史记》。问何人所作，曰司马迁。又问渠是何科进士，曰汉史令，非进士也。钜公取其书略观之，即掩卷曰亦不见得。〔32〕

在这制度下的这个时代，学术思想的贫乏，是必然的，也是应该原谅的，因为他们根本不许有思想。〔33〕政治家财政家的寥寥可数，也是有其社会背景的，有其特别的原因的，因为那个时代根本没有培养这类人才的专门教育。

学校原来是作育人才之所，明制乡里有社学，府州县有府学州学县学，卫所有卫学，南北两京则有国子监。《明史》说：

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风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34〕

看表面上似乎真是极一代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然而在事实上恰好相反。我们先看社学的情形。明太祖曾严示官吏以社学扰民：

社学一设，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将此辍生员之数，欺诳朝廷。〔35〕

此后便无声无臭，名实都亡了。至于府州县学，以明制诸生入仕必由科举，学校失去独立培养人材的地位，在开国后即已不为社会所重视。宋濂曾说：

近年以来，急于簿书期会，而视教民为悠缓。司学计者以岁月序迁，豪右海商，行贿宽荐，往往来倚讲席，虽有一二君子获厕其中，孤薰而群莠。一鼓吻，一投足，辄与之枘凿。唯彼饮食是务，号称子游氏之贱儒者，日月与居。是故稍励廉隅者不愿入学，而学行彰彰有闻者，未必尽出于弟子员。^{〔36〕}中叶以后，则学校竟如废寺，无复生徒肄业。陆容记：

作兴学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谓作兴，不过报选生员，起造屋宇之类而已。此皆末务，非知要者……况今学舍屡修，而生徒无复在学校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深可叹息。^{〔37〕}

两京国子监也日渐废弛，学生品质不齐，人才日下。郭明龙任国子监祭酒，《脩陈雍政疏》说：

臣初试士，举人仅五七人，其文理优长，考在前列者尽选贡耳。向非选贡一途，太学几无文字矣。臣窃叹天下府州县学之士，尽皆属文，而太学之士，乃半居写仿。又府州县学之士，不无以文理被黜而来，与夫商贾之挟重糶者，游士之猎厚藏者，皆得入焉。是古之太学，诸侯进其选士，选最优最上者贡之天子，而今之太学，郡邑以其被访被黜，无文无行者纳之辟雍，良可叹也。

郭去，刘幼安代之，朱国桢为司业。刘每叹曰：“成甚国学，朝廷设此骗局，骗人几两银子。我为长，兄为副，亦可羞也。”^{〔38〕}这是明代的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告诉他的教务长的老实话。

在这一套的教育组织下，自然谈不到培养人材。而且，国子监从景泰元年（西元一四五〇）开纳粟之例以后，豪绅地主商人的子弟因纳粟纳马而入监，称为例监。^{〔39〕}末年地方学也因军费